

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

——历史发展、特征及困境*

孟 瑾**

内容提要 突尼斯总工会是突尼斯代表性最高、动员能力最强的工会组织。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突尼斯总工会从解放斗争时期到民主政治转型时期深度参与到突尼斯政治发展进程中。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呈现成员构成多元、政策立场独立、历史底蕴深厚、组织结构完整、行动方式灵活等特征。然而，受突尼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限制，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妥协性较为突出。突尼斯政治体制特点导致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趋于无序化。政治定位和政党偏好上的摇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不同诉求给突尼斯总工会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发展战略带来挑战。

关键词 工会 突尼斯总工会 政治参与 社会组织 社会运动

政治参与是联系公民与国家的纽带，是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① 广泛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民主的基本条件，而且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当今政治生活中，选举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但由于选举程序不透明、精英阶层固化、政党代表性弱等问题，选举这一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通常难以真实表达民众的政治偏好。在西方代议制民主面临制度性危机的情况下，社会行动者不断探索新的民主场域与制度可能。工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世界经济”资助项目（DF2023ZD34）的阶段性成果。

** 孟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① [美] 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3页。

会因其较强的动员能力和较为完整的组织架构通常是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组织之一。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工会通过组织社会运动,开拓公共空间,凝聚政治共识等方式推动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为民众实现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工会等社会组织值得学界和政治实践者深入研究。

突尼斯工会历史根基深厚,自主性较强,在突尼斯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突尼斯是唯一成功避免政治动荡、平稳推进政治转型的北非国家。^①突尼斯总工会(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 UGTT)是突尼斯代表性最高、动员能力最强的工会组织。突尼斯总工会深度参与到突尼斯政治发展进程中,在突尼斯政治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突尼斯政治的研究主要涉及突尼斯政治转型、突尼斯政党制度等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尚未从社会视角聚焦以突尼斯总工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动。^②国外相关研究通常运用西方民主理论分析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转型时期的作用,但尚未从政治参与视角探析突尼斯总工会在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③本文旨在回顾突尼斯总工会在突尼斯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参与作用,分析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特点并探析当今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所面临的困境,以期呈现以工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国家政治发展图

-
- ① 曾向红、陈亚州:《政治妥协与突尼斯的和平政治过渡——基于对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外交评论》2016年第2期。
- ② 参见易小明《转型时期的突尼斯政党政治:左翼政党透视》,《西亚非洲》2017年第2期;余维海、高云《突尼斯左翼政党的发展演变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李竞强《突尼斯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李竞强《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及其困境》,《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2期。
- ③ See Najet Mizouni, “L’UGTT, Moteur de la Révolution Tunisienne,” *Tumultes*, No. 38–39, 2012, pp. 71–91; Mohamed-Salah Omri, “No Ordinary Union: UGTT and the Tunisian Path to Revolution and Transition,” *Workers of the World*, Vol. 1, No. 7, 2015, pp. 14–29; Kasper Ly Netterstrøm, “The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and the Advent of Democrac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0, No. 3, 2016, pp. 383–398; Hèla Yousfi, *Trade Unions and Arab Revolutions, the Tunisian Case of UGTT*, London: Routledge, 2019; Dina Bishara, “Legacy Trade Unions as Brokers of Democratization? Lessons from Tuni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52, No. 2, 2020, pp. 173–195; Golrokh Niazi, “Episodes of Contention, Bonds of Trust: The UGTT and ‘New’ Trade Union Activism in Post-Ben Ali Tunisia,” *Globalizations*, December 2021.

景中的位置和作用。

一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角色的历史演进

突尼斯总工会在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政治参与经历了从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组织到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的转变。突尼斯总工会在当今政治参与中发挥的作用是其历史角色的延伸。认识突尼斯总工会在当今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需要考察其在突尼斯不同历史时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殖民统治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大部分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类似，突尼斯工会的产生并不是经济结构中劳工和资本冲突的产物，而是受宗主国社会运动和思潮外部刺激的结果。^① 突尼斯在 1881 年沦为法国保护国之后，殖民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外国移民不断增加。20 世纪初，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突尼斯出现了由法国人、马耳他人、意大利人以及少量突尼斯人组成的工会——工人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CGT）。^② 但是，该工会隶属于法国总工会，由法国工人主导。在工会内部，突尼斯工人由于数量少、力量小，处于边缘地位，其利益难以得到保障。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突尼斯早期工会主义者穆罕默德·阿里·埃尔·哈米（Mohamed Ali El Hammi）同社会活动家塔哈尔·哈达德（Tahar Haddad）于 1924 年 12 月成立了突尼斯第一个本土工会——突尼斯工人总联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Tunisiens, CGTT）。这也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民族工会。为保护突尼斯工人的利益，突尼斯工人总联盟多次组织工人罢工，对法国殖民统治造成威胁。由于其较强的激进性，突尼斯工人总联盟最终在殖民者的逼迫下解散。虽然突尼斯第一个工会组织没能得以存续，但这次工会实践刺激了突尼斯民族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突

^① Charles A. Orr, "Trade Unionism in Colonial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 Studies*, Vol. 4, No. 1, 1966, pp. 65-81.

^② 蒋真、李竞强：《突尼斯史》，商务印书馆，2022，第 156 页。

尼斯早期工会运动提供了组织和思想基础。^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主义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高潮。1946年1月，法国总工会突尼斯分支成员法哈特·哈其德（Farhat Hached）脱离该组织创建了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总工会得到了国际支持，吸引了大多数突尼斯工人的加入。突尼斯总工会在为突尼斯人民争取社会、政治权利的同时，不断发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支持和声援民族主义政党新宪政党（Néo-Destour）领导的民族独立斗争，增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由于殖民当局对新宪政党的残酷镇压，突尼斯总工会一度成为争取独立的主要政治运动，承担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和组织任务。^②

在殖民统治背景下，突尼斯总工会领导的社会运动具有反剥削、反压迫的性质，其目标和诉求超越了劳工关系领域。作为先进力量的代表，突尼斯总工会将社会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两个“反体系运动”结合起来，通过罢工和示威游行持续施压加速了殖民统治最终瓦解，为突尼斯主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突尼斯总工会的出现是突尼斯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其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推动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初步形成，开启了突尼斯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突尼斯总工会在殖民时期的抗争经验奠定了其在突尼斯政治图景中的地位，其在殖民时期的斗争实践为其参与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二）独立初期：由国家战略支持者转向社会利益捍卫者

在突尼斯人民的抗争下，突尼斯于1956年获得民族解放，建立了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统治下的独立政权。突尼斯总工会在独立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其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突尼斯独立时总工会会员规模达15万人，仅次于新宪政党。独立后，布尔吉巴领导下的政府在加强对突尼斯总工会控制的同时将其纳入新宪政党主导的法团主义体系，获

① Dina Bishara, "Legacy Trade Unions as Brokers of Democratization? Lessons from Tuni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52, No. 2, 2020, pp. 173-195.

② 突尼斯总工会领袖法哈特·哈希德（Farhat Hached）于1952年遭法国右翼团体暗杀。这一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该组织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取和巩固民众对新生政权的支持。一方面，煽动突尼斯总工会内部的分裂，将总工会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限制其发展。突尼斯政府通过扶持亲政府的工会领导人，分化工会力量，削弱工会对政府的制衡作用，使其成为新宪政党的附属组织。突尼斯总工会领袖法哈特·哈希德于1952年遭法国右翼团体暗杀后，艾哈迈德·本·萨拉赫（Ahmed Ben Salah）担任突尼斯总工会总书记。为削弱艾哈迈德·本·萨拉赫在总工会内部的影响力，突尼斯政府于1956年任命身为新宪政党政治局委员的艾哈迈德·特里利（Ahmed Tlili）为新的总书记。^①另一方面，通过向突尼斯总工会领导人提供中央、地方政府的重要职位实现政治吸纳。1961年7月，为了拯救国民经济，布尔吉巴转而推行宪政社会主义路线，恢复了萨拉赫的名誉，任命其为计划与经济部部长。萨拉赫开始实施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等一系列计划经济改革政策，在突尼斯推行“宪政社会主义”。^②执政党对突尼斯总工会领导人的政治吸纳巩固了政府的民意基础，并使突尼斯独立初期的发展路线符合总工会的总体诉求。与此同时，突尼斯总工会支持国家战略，积极配合宪政社会主义实验，保障了和谐的劳资关系和稳定的政治局势。

20世纪70年代，宪政社会主义实验由于不符合突尼斯经济社会实际而宣告失败。突尼斯政府重新调整方向，实行“有限制的自由开放”经济政策。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实施大大加深了突尼斯社会的贫富差距，工人的处境越发艰难，不满情绪日渐高涨。基层工会组织罢工，抗议政府经济政策不力。在基层工会的推动下，突尼斯总工会逐渐从附属于政权的组织转变为推进政治经济变革的主要力量。哈比卜·阿舒尔（Habib Achour）在1970年后执掌突尼斯总工会，将其转变为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堡垒。^③突尼斯总工会和政府的紧张关系在1978年1月26日的全国大罢工中达到顶点。这是突尼斯独立以来工会发起的首次大罢工。此次罢工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表达了政治多元化的诉

① [英] 肯尼斯·帕金斯：《突尼斯史》，姜恒昆译，东方出版中心，2012，第137页。

② 然而，这些经济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导致布尔吉巴在1969年解除了本·萨拉赫的职务。

③ Mohamed Ennaceur, "Les syndicats et la mondialisation: le cas de la Tunisie,"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études sociales, Documents du travail, DP/120/2000, Genève.

求。罢工最终演变成反对布尔吉巴政权的政治运动，包括阿舒尔在内的许多突尼斯总工会领导人在此次罢工中被捕。突尼斯总工会与执政党的关系由此急剧恶化。

独立初期，突尼斯总工会与布尔吉巴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从“政治吸纳”到“对抗冲突”的演变轨迹。突尼斯总工会在独立斗争中积累的群众基础使其成为新生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突尼斯总工会被布尔吉巴政府纳入国家政治体制，其政治参与功能被制度化，成为政权和民众间的缓冲器。此举强化了国家对社会力量的统合能力，暂时赋予突尼斯政治结构一定的包容性和稳定性。但是，在国家政策脱离国情导致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突尼斯总工会的基层组织率先发起罢工，以社会抗争方式倒逼工会高层与政权决裂。

（三）本·阿里统治时期：政权的合作方和制衡者

在突尼斯经济发展停滞、政局陷入动荡的背景下，时任总理本·阿里（Ben Ali）以总统身体状况欠佳为由于1987年11月发动不流血的政变，成为突尼斯独立后第二任总统。本·阿里执政后，政治上通过推行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进一步确立其强人政治。经济上全面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加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① 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性，本·阿里政府在加强对突尼斯总工会控制的前提下避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② 一方面，本·阿里政府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同时保障工人的权益，将突尼斯总工会的诉求纳入经济决策过程中，赋予其形式上的参与权，使其难以提出激进的经济要求。在政府支持下，突尼斯总工会定期与雇主协会就劳资问题进行谈判，使得突尼斯工人的利益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缓解了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冲击，但其政治参与功能被大大弱化。另一方面，本·阿里政权通过内部渗透、释放政治犯、收买贿赂等手段来对突尼斯总工会领导层实现政治收编和利益捆绑，通过权力分配确保总工会领导层对其政权的忠诚。许多

① See Steffen Ertle, *Ben Ali's "New Tunisia" (1987-2009): A Case Study of 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2010.

② Kasper Ly Netterstrøm, "The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and the Advent of Democrac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0, No. 3, 2016, p. 387.

中央和地方的总工会领导与本·阿里政权关系密切，甚至有些是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的成员或议员。^①

但是，本·阿里及其领导的宪政民主联盟没有意愿将表面的多元开放政策转变为真正促进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面对本·阿里政权的渗透和控制政策，地方工会和教育、邮政等行业利用组织分散性试图保持独立性。2000年和2003年，在本·阿罗斯和凯鲁万的地方工会选举中，左翼工会成员成功罢免亲政权领袖。突尼斯总工会领导层中约1/3的领导职位被激进派取得。工会内部的分化是突尼斯社会对政治现代化路径不满的缩影。工会成为不同政治理念的角力场，客观上推动了政治多元意识的萌生。

可见，突尼斯总工会在本·阿里统治下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双重性，即在合作与抵抗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复杂性揭示了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既是政权维护稳定的工具，又是民众进行社会抵抗的载体。尽管对工会政治参与的压制在一定程度上换取了经济效率的实现，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危机导致工会的有限合作无法掩盖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失败。基层罢工及工会内部激进派的活跃逐渐瓦解了政权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基层工会成为推动政治抵抗、聚集社会力量的阵地，为改革和推翻固有政治体制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四）“茉莉花革命”时期：革命的领导者和推进者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出现后，突尼斯经济发展再次遭遇瓶颈，本·阿里的政治统治日益僵化，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被持续消耗。2010年末2011年初，一名26岁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引发了突尼斯境内一系列民众抗议活动，导致本·阿里政权倒台。这场由民众主导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突尼斯总工会在这场政治剧变中再次展示了其作为社会和政治力量的重要作用。突尼斯总工会利用其广泛的基层网络动员了大量工人和社会各界参与抗议活动，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为确保抗议活动持续有序进行提供了重要的后勤和组织支持，最终迫使本·阿里政权倒台。

^① Zuzana Hudáková, "Civil Society in Tunisia: From Islands of Resistance to Tides of Political Change,"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6, No. 3, 2021, p. 504.

突尼斯总工会在“茉莉花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促使运动政治化。革命早期,抗议者仅以“保障就业权、促进区域发展平衡”等经济社会诉求为口号。大多数工会主义者政治意识较强,主张革命的政治化,将经济社会诉求与政治目标相结合。随着突尼斯总工会的介入和指导,反腐败、推翻本·阿里政权成为革命目标。在总工会的引导下,最初自发性的游行演变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革命的政治化使运动的目标超越了工人阶级的诉求,扩大了运动的影响力,使广大民众普遍对革命产生了认同感。这场运动从内陆地区蔓延至沿海地区。突尼斯总工会于2011年1月14日组织全国范围总罢工,最终导致本·阿里政权的倒台。^①其二,突尼斯总工会为革命参与者提供避难所和言论空间。总工会及其地方办事处致力于保障言论自由,为反对派提供发声和讨论的平台,成为异见人士实现政治表达的稀有空间。“茉莉花革命”期间,突尼斯总工会,特别是教师、医疗卫生等行业工会以及地方工会办事处,成为庇护政治活动家的场所。当反对力量受到威胁时,他们常向工会寻求庇护。其三,协调不同参与群体之间的活动。在突尼斯的革命过程中,突尼斯总工会为各类参与者进行了详细的任务分工,促进不同组织和团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共同抵抗政权的镇压,推动了革命进程。例如,总工会加强了与失业毕业生、律师等群体的合作。工会负责日常组织示威和集会活动,青年群体(失业者、大学生和高中生)在夜晚与警方进行游击战,律师则为政治犯辩护。这种分工不仅增强了抗议运动的组织性和持续性,还确保了不同群体的诉求得到更全面的表达和回应,使部门性罢工转变为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其四,负责与政府部门的协商和调解,确保抗议活动的持续进行。^②突尼斯总工会在革命期间调解抗议者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防止抗议者陷入与政府的直接冲突,避免其被捕或遭受迫害;另一方面确保抗议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政府的许可和容忍。

“茉莉花革命”期间,突尼斯总工会一方面通过将分散的经济诉求提升

① Najet Mizouni, “L’UGTT, moteur de la révolution tunisienne,” *Tumultes*, No. 38–39, 2012, pp. 86–88.

② Hèla Yousfi, “Organization and Organizing in Revolutionary Times: The Case of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 Vol. 30, No. 4, 2023, pp. 624–648.

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实现了社会运动的政治化；另一方面利用其广泛的组织网络和基层渗透力协调和动员社会不同群体，建立跨阶层联盟，实现了对不同社会群体多元力量的整合。突尼斯总工会的组织性和动员力使突尼斯避免了军队介入的武装对抗，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了政权更迭，为突尼斯成为唯一平稳推进政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奠定了基础。

（五）政治转型时期：政治危机中的斡旋方与调解者

“茉莉花革命”导致本·阿里政权倒台，结束了宪政民主联盟一党独大的专制统治。突尼斯进入政治转型时期，出现了世俗主义政党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左右阵营对立的局面。突尼斯总工会的历史声望和动员能力使其成为各方信任的调解人。作为关键的调解者和“权力掮客”，突尼斯总工会成功地促成了多个政治派别之间的对话，在政治过渡期内保障了国家的稳定，促进了突尼斯政治转型进程。

本·阿里下台之后，时任众议院议长的福阿德·迈巴扎（Fouad Mebazaa）出任代总统。迈巴扎在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后，承诺在半年内组织议会和总统选举。但是，由于突尼斯国内的各政治力量意见不一，选举日期一再被推迟。在这一背景下，突尼斯总工会召集各类政治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发起并主持了“保卫革命委员会”（Committee to Safeguard the Revolution），推行法律和政治改革，筹备制宪议会选举。最终，制宪议会选举于2011年10月举行，伊斯兰复兴运动以41.1%的得票率赢得大选，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组建联合政府。

突尼斯独立以来，世俗主义政党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伊斯兰政党的崛起是突尼斯转型时期的重大变化。世俗力量和伊斯兰力量的关系陷入僵持，社会对立加剧。2013年，两名世俗反对派政治人物肖克里·贝莱德（Chokri Belaid）和穆罕默德·布拉希（Mohamed Brahmi）先后遭暗杀，突尼斯再次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突尼斯总工会又一次行动起来，邀请突尼斯人权联盟、突尼斯律师协会、突尼斯工贸及手工业联合会组成全国对话四方集团（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2013年10月4日，全国对话四方集团主持召开“全国对话大会”，突尼斯主要政治力量摒弃意识形态和利益分歧，一致同意解散现政府，成立一个由技术专家领导的看守政

府，以确保社会和平和政治稳定。^① 2014年，突尼斯制宪议会通过新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多党制、责任制政府等基本制度，标志着突尼斯从专制时代向现代政治时代的转变。在突尼斯总工会的倡导下，全国对话四方集团成功通过全国对话协商实现了政府的重组，保障政治转型顺利进行，推进了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程。^②

突尼斯总工会在后“茉莉花革命”时期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促进政治调解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突尼斯总工会通过组织“保卫革命委员会”，填补了旧政权解体后的制度真空。在世俗政党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峙时期，工会以第三方力量身份介入，防止任一政治派系对统治权力的垄断。突尼斯总工会利用其组织资源将“街头政治”转化为制度化协商，促进各方政治力量达成共识，保障政治转型顺利进行。这不仅体现了其在突尼斯政治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也反映了其在政治转型时期通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的能力。

二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主要特征

突尼斯总工会是突尼斯政治性最为突出、政治参与程度最高的社会团体。政治性社会团体是现代社会政府与公民大众之间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其发展程度标志着现代社会政治的发展程度。^③ 作为有组织地参与、影响政治事务和政府决策的社会团体，突尼斯总工会具有政治性社会团体成员构成多元、政策立场独立等一般特征。而深厚的历史底蕴、完整的组织结构以及灵活的行动方式使其政治参与功能较其他社团组织更为突出。

（一）从政策立场看，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参与中保持独立自主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社群集合，社团组织与以国家和政党等为代表的“政治社会”相区隔，使其成为整合社会多元利益、防止政治竞争极化的社会力量。^④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作用的发挥亦基于其独立自主的政

① Dina Bishara, "Legacy Trade Unions as Brokers of Democratization? Lessons from Tuni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52, No. 2, 2020, pp. 173-195.

② Rory McCarthy, "The Politics of Consensus: Al-Nahda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Tunisian Transi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5, No. 2, 2019, p. 267.

③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第170~172页。

④ 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比较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第104~105页。

策立场。尽管突尼斯政府一直尝试对突尼斯总工会加以控制，但突尼斯总工会坚持代表工人阶级和群众利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不受特定政治势力的限制。突尼斯总工会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秉持政治中立的立场，与执政党、反对党及其他社会组织保持密切的关系，与各个权力机构建立沟通。因此，在关键历史时刻，突尼斯总工会能够充当各方都能接纳的调停者，成为共识政治文化的载体。

突尼斯总工会能够保持独立性的原因如下。其一，突尼斯总工会深度参与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新政权的建立，为其保持政治独立性提供了历史基础。突尼斯总工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其在新政权成立时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并在突尼斯政治发展进程中成为较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其二，突尼斯总工会组织机构复杂，基层组织网络完整，政府难以对其实现全面掌控。尽管突尼斯总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掌控领导权，但基层代表机构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选择支持或不支持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因此，在总工会的中央领导层面受到政府的打压或成为政府政治吸纳的对象时，地方代表机构依然能够保有“内部独立性”，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在工人利益严重受损的时刻维护工人利益，并自下而上地影响中央领导层的决策。^① 例如，在“茉莉花革命”初期，由于与本·阿里政权的利益牵连，全国执行委员会对革命持保留态度。在地方工会的积极推动下，全国执行委员会才转而支持革命。其三，突尼斯总工会的行业组织分布广泛，覆盖突尼斯主要经济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使其具有影响经济生产和社会运行的能力。突尼斯总工会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力一方面使其在财政上能够独立，为社会运动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另一方面增加了其与政府或相关经济部门谈判时的筹码和议价能力，确保了组织游行罢工等社会运动的效果。

（二）从成员构成看，突尼斯总工会代表的政治和社会阶层广泛多元

与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相同，突尼斯总工会的产生及发展轨迹与西方国家工会有一定差异。西方国家工会是在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资本主

^① Michele Penner Angrist, "Understanding the Success of Mass Civic Protest in Tunisi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7, No. 4, 2013, pp. 547-564.

义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确立出现的一种以劳工为主体的组织形式。因此,西方工会的成员构成通常以传统制造业、公共服务业等行业工人为主,具有一定均质性。而在突尼斯总工会创立时,突尼斯社会仍处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前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劳资为基础的雇佣关系和以部族、族群为特征的传统社群关系杂糅在一起,使无产阶级呈现高度多元化的特点。突尼斯总工会在成立之时便明确将自身定位于跨越阶级的、代表整个突尼斯民众的社会组织。突尼斯总工会介于社会组织与政治行为体之间,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性质的组织,还是一个政治参与的枢纽和平台。这一定位决定了突尼斯总工会不仅致力于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需要动员突尼斯社会通过政治参与实现突尼斯民众的福祉。

(三) 从组织文化看,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深厚

突尼斯总工会的发展历程贯穿突尼斯现代史,在突尼斯历史发展各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赋予其较强的政治合法性和群众动员力。突尼斯总工会诞生于民族解放运动期间,与民族主义政党并驾齐驱的发展历程赋予总工会其他社会组织难以比拟的历史合法性。^① 突尼斯总工会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了群众基础。“茉莉花革命”期间,突尼斯总工会展现出较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政治转型时期,突尼斯总工会成功促进各方力量达成政治共识使其在突尼斯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得以巩固和凸显。近80年的发展历史和与政府长期的共存经验为其参与突尼斯政治发展奠定了历史根基和实践依据。

经过历史的积淀,工会运动和工会文化已成为突尼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嵌入到突尼斯社会当中。^② 突尼斯总工会所领导的社会运动塑造了突尼斯社会的抵抗文化和集体认同感,成为社会正义的象征。^③ 这种文化根基使得突尼斯总工会在社会中享有广泛的支持和尊重。深厚的历史根基、广泛

① 李竞强:《突尼斯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第228页。

② Mohamed-Salah Omri, “No Ordinary Union: UGTT and the Tunisian Path to Revolution and Transition,” *Workers of the World*, Vol. 1, No. 7, 2015, p. 24.

③ Golrokh Niazi, “Episodes of Contention, Bonds of Trust: The UGTT and ‘New’ Trade Union Activism in Post-Ben Ali Tunisia,” *Globalizations*, December 2021, p. 7.

的社会动员、丰富的斗争实践以及其在突尼斯社会和文化中的深远影响共同塑造了突尼斯总工会在突尼斯政治社会变革中的关键角色，使其成为政治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突尼斯的工人运动和政治发展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四）从组织结构看，突尼斯总工会的组织结构严密完整

在组织结构上，突尼斯总工会拥有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使其在政治参与中能够调动各项资源。不同于普通的社会组织，突尼斯总工会覆盖面广、层级化程度高、决策机制较为完善，这些特征确保总工会较为高效地开展活动。作为突尼斯唯一一个全国性工会，突尼斯总工会拥有约 75 万名成员，汇集了全国各地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包括工厂工人、公务员、医生等。突尼斯总工会设立四个层级结构——国家、省级、行业 and 基层——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网络。突尼斯总工会各层级机构均设有正式的办公地点和专职人员，配备完善的办公设施支持其日常运作和活动。

突尼斯总工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全国代表大会，由各地和各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制定全国性的政策和战略，选举全国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突尼斯总工会最基本的单位是工厂、企业或机构内部的工会小组。这些小组负责直接联络和服务其成员，处理日常工作问题和争议。多个工会小组组成中间层级——省级和行业工会，其委员会负责在更大范围内协调和管理工会活动。省级工会执行委员会由基层工会代表按省份选举产生，负责组织 and 协调该省的工会活动。除了地理上的分支，突尼斯总工会还按部门建立了行业工会，囊括了突尼斯几乎所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生产领域，如矿业、旅游业、制造业、教育、医疗等。这些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工会分支机构确保了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工人诉求都能得以表达。^①

在决策机制上，突尼斯总工会采用中央集权管理模式，通常每隔四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全国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并制定未来战略方向。突尼斯总工会中央领导层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而非基层成员直

^① Ferial Zaghdane and Moosa Elayah, *UGTT in Tunisia Empowered or Overpowered, A Re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unisia*, Governance and Peacebuilding Center, May 2020, pp. 5-6.

接选举产生。这一管理模式使得总工会能够较为高效地调配资源和制定议程。这种集中化、层级化的决策机制将主要权力集中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手中，使得总工会领导层能够通过给予特权和与各级工会代表结盟来进一步巩固权力。^① 尽管采用中央集权管理，突尼斯总工会的地方分支享有相对的自主权，可以在必要时动员抗议活动。各级组织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和决定工会政策和行动计划，确保了工会政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与此同时，突尼斯总工会的地方分支与当地社区保持紧密联系，使其拥有深厚的地方根基，能够自主有效地动员社区成员参加工会活动和社会运动。

（五）从行动方式看，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方式动态灵活

作为利益团体组织，突尼斯总工会的主要宗旨是保障和提升工人利益，但其原则立场包含了经济工会、社会工会和政治工会的特征。由于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社会变革中不可忽视的作用，突尼斯政权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当时的权力博弈关系对总工会采取的政策存在差异性。无论是开国总统布尔吉巴通过个人威望树立“克里斯玛”型领导人的统治权威，还是本·阿里总统以有限多元主义巩固其强人统治，突尼斯领导人都以既拉拢又控制的方式利用工会组织。作为法团主义组织，突尼斯总工会拥有较为宽松的政治活动空间。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统治政权下，突尼斯社会政治参与的方式有所区别。突尼斯总工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灵活地选择与政府合作或对抗。^② 在政治气候较为宽松，总工会与政府关系和谐时期，突尼斯总工会选择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问题，努力在维护工人权益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例如，在突尼斯独立初期，总工会与政府紧密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布尔吉巴总统试图利用总工会的群众基础巩固新生政权。总工会支持布尔吉巴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参加了首届政府。但是，当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损害工人权益，压制工会发展时，总工会采取对抗立场，采用罢工、示威游行等更为激进

① Hèla Yousfi, "Organization and Organizing in Revolutionary Times: The Case of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 Vol. 30, No. 4, 2023, pp. 624-648.

② Riadh Zghal, "Nouvelles Orientations du Syndicalisme Tunisien," *Monde Arabe*, Vol. 4, No. 162, 1998, p. 7.

的方式组织表达诉求。例如，在布尔吉巴统治后期以及本·阿里统治时期，随着国家治理问题日益凸显，经济上全面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总工会与政府矛盾激化，组织罢工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采取削减工人福利的措施。^①

可见，突尼斯总工会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展示了高度的灵活性，通过合作与对抗的动态平衡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这种灵活性使突尼斯总工会不仅能够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有效地维护工人权益，而且确保其在突尼斯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以实现社会进步和正义等长期目标。

三 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面临的现实困境

政治参与是政治行为类型的一种。^② 同其他政治行为一样，政治参与受到结构性因素与施动者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作用的发挥同样受到政治经济宏观结构和组织自身因素的影响。^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生产力的变革是最根本的，其变化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带来政治社会制度的变革。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实现政治权力和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径^④，政治参与的效能受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治体制等结构性因素制约。同时，一个集团是否会为增进其共同利益或实现其共同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还取决于该集团的内部组织能力。因此，突尼斯总工会政治参与的效果与突尼斯总工会这一政治参与主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密切相关。对于突尼斯总工会这一政治性社会团体而言，内部政治分歧、基层地区差异制约着其政治参与作用的发挥。

① Raymond Hinnebusch, "Political Parties and Trade Unions," in Youssef M. Choueiri, ed.,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351.

② 政治管理行为和参与行为是一个政治体系行为构成的基本内容。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第203页。

③ Manlio Cinalli,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arco Giugni and Maria Grass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489-504.

④ 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第217页。

（一）突尼斯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导致总工会政治参与的妥协性较为突出

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成正相关关系。^① 突尼斯工会运动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突尼斯现代化进程受挫，法国建立殖民主义统治的背景下出现的。殖民主义经济促使突尼斯经济结构由自给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低薪雇佣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转型。同时，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传播刺激了殖民地国家工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同其他中东国家工会一样，突尼斯工会的产生主要受外部条件的刺激，而非自身经济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结果。虽然突尼斯在 1837 年开启了现代化改革，但直到 1881 年沦为法国“保护国”，突尼斯尚未出现工人阶级，传统势力在政治经济体制中占主导地位。突尼斯工会是在法国殖民统治的压迫下和法国工人主导的工会实践的影响下产生的。内生性的缺乏导致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参与中通常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革命性较差。尽管突尼斯总工会是“茉莉花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并且在后革命时期审时度势推动政权平稳过渡，但这一“准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并不彻底，未推翻以新自由主义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国家很快回归原有的运行轨迹。^② 当前，突尼斯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工人阶级力量依旧薄弱，工会运动的作用难以发挥。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新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没有完全确立的情况下，社会运动这一政治参与方式难以催生出新的制度和新的权力结构。

（二）突尼斯政治体制特点导致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趋于无序化

不同政体类型下的政治参与具有差异性。^③ 维巴等认为，国家内部权力

① 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第 228 页。

② Mustapha Jouili, “Imperialism and Neoliberal Redeployment in Post-Uprising Tunisia,”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32, No. 2, 2023, p. 202.

③ 包刚升：《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 253 页。

的集中程度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呈现一种负向关系，即权力越集中，参与水平越低。^① 在统治权力日益集中的情况下，突尼斯社会的政治参与被统治者操控或限制。当今，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突尼斯政治经济矛盾日益激化。在传统政治精英无力解决积弊的情况下，反建制派领导人凯斯·赛义德于2019年以无党派身份赢得总统大选并于2024年10月在投票率极低（27.7%）的情况下得以连任。赛义德总统通过建立总统制、压制反对派、削弱司法机构独立性等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窃取了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果实。以突尼斯总工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再次进行社会动员，通过组织罢工、示威游行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向政府施压，争取工人权益，维护宪法地位。过于集中的权力制度、长期存在的贫困和失业问题成为当前突尼斯社会“日常抗议”的主要议题。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政府极力压制社会组织的政策阻塞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建立对话的渠道，政治参与趋于无序化。

（三）政治定位和政党偏好上的内部分歧影响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参与中的策略选择

突尼斯总工会拥有庞大的会员基础和复杂的组织结构，内部各派系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分歧，在政治定位和政党倾向上摇摆不定。这导致突尼斯总工会活动范围过于分散而广泛，对总工会的统一行动和决策构成挑战。^②

突尼斯总工会内部不同阶层对工会的政治定位存在分歧。突尼斯总工会的主要构成力量是政府雇员、国有企业员工、私有企业员工等拥有稳定体面收入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他们倾向于赋予工会更强的政治角色，认为突尼斯总工会应该继续发挥政治作用，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而处于边缘地位的临时工、失业人员等底层工人阶级则认为突尼斯总工会过度参与政治会分散其关注点，使其无法有效履行维护总工会成员利益的职责。

① Sidney Verba,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② Dina Bishara and Sharan Grewal, "Political, Not Partis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54, No. 3, 2022, pp. 453-476.

政治化可能会导致总工会被政党利用，失去独立性和公信力。他们主张总工会应专注于其传统职责，即维护和提升工会成员的经济利益，为工会成员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① 关于工会政治定位的分歧不仅影响了总工会内部的决策过程，而且造成工会内部的分裂，影响了工会的统一行动。

突尼斯总工会内部政党倾向复杂多元。突尼斯总工会在政党倾向上总体较为中立，通过在现有政党之间进行调解来发挥其影响力，而不是直接参与选举或支持特定政党。但是，突尼斯总工会内部构成较为复杂，包含了从左派到右派的不同组织，因此政党倾向上也存在差异。总体上，左翼力量在突尼斯总工会内部占主导地位，总工会内部的世俗派领导层更倾向于支持世俗左翼政党。代表左派的教师工会、医疗卫生、邮政等行业工会也表现得较为强势。在伊斯兰主义势力日益复兴的情况下，突尼斯总工会成为左翼力量加强联系的平台。在这一背景下，倾向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突尼斯总工会领导人于2013年从总工会分离出来，成立突尼斯劳工组织（Tunisian Labor Organisation）。但是，在基层组织层面，大部分伊斯兰主义者保留了其成员身份，参与支持突尼斯总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在突尼斯总工会内部，伊斯兰主义者认为总工会的左倾政治立场过于鲜明，而左翼分子则认为总工会对伊斯兰主义的包容和妥协影响了革命目标的实现。^② 突尼斯总工会内部对于政治定位和政党倾向的分歧导致其在发展方向上摇摆不定，总是在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之间徘徊，使其难以真正引领工人运动，通过政治参与推动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如何平衡不同政治立场和政党倾向的成员之间的关系，避免内部进一步分裂仍是突尼斯总工会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

（四）地区之间的诉求差异限制了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参与中的动员能力

总体而言，突尼斯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向沿海地区倾斜，尤其在基础

① Saerom Han, "Mobilizing within and beyond the Labor Union: A Case of Precarious Workers' Collective Actions in North Africa," *ILR Review*, Vol. 76, No. 4, 2023, pp. 674-696.

② Dina Bishara, *Labor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Egypt, Drivers vs. Objects of Change in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January 2014, p. 7.

设施、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给予首都突尼斯市和中部沿海地区更多支持。这导致沿海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而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相对贫困，基础设施落后，长期处于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状态。地区间的不平衡在突尼斯总工会内部也有所反映。^① 内陆地区的地方工会对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尤为关注。该地区的工会成员通常更加支持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希望通过工会的政治影响力来推动政府关注并解决内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内陆地区的工会组织在历史上经常推动突尼斯总工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政治立场。例如，在导致本·阿里政权倒台的革命中，内陆地区的工会组织发挥了先锋作用，继而推动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而沿海地区的工会成员则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更关注经济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不支持工会以激进方式参与政治事务，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处理与政府、雇主的关系。区域间的紧张关系会加剧内部的分歧，使得工会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立场，最终影响其动员能力。

结 语

工会不仅是保障工人群体利益的组织，而且是表达广大民众政治社会诉求的平台。突尼斯总工会的出现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重要转折，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使其在突尼斯政治发展进程中能够坚定表达民众意愿和诉求，维护群众利益。突尼斯总工会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丰富了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实践，塑造了突尼斯抵抗文化和共识政治，使其在突尼斯政治图景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突尼斯总工会成员囊括了拥有不同政治倾向、社会阶层、职业背景的社会群体，其多元异质的成员构成赋予突尼斯总工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聚合修复能力。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渠道不同于政党，不寻求通过选举参与政权的争夺，而是通过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走向。突尼斯总工会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表明社会组织的参与方式不限于游行、示威或其他占领公共场

^① Hèla Yousfi, "UGTT at the Heart of a Trouble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Werner Puschra and Sara Burke, eds., *The Future We the People Need, Voices from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Europe & North America*, New York: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2013, pp. 23-28.

所等社会抗争，还构成了聚合不同政治力量、弥合政治分歧、促进政治共识的平台。

突尼斯是较早开启政治现代化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总工会以其文化和组织优势通过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突尼斯政治转型进程。突尼斯总工会所承担的政治参与角色体现了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然而，受突尼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限制，工人阶级力量弱小且分散，难以发动和组织彻底的民众革命。在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下，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功能被过度限制。突尼斯总工会的政治参与暴露出一定妥协性，其领导和参与的社会运动并未推翻既有的政治秩序。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重组，伊斯兰势力不断抬头，西方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日益凸显。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突尼斯政治经济矛盾日益激化，如何更有效地实现政治参与仍是突尼斯总工会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责任编辑：张玉友]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Dilemmas

Meng Jin / 275

Abstract: The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UGTT)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rade union with the greatest mobilisation capacity in Tunisia. As an important actor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t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unisia from the period of liberation struggle to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UGTT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membership, independent policy position, profound historical legacy, well-structured organization, and flexible modes of action. However, due to the sta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unisia, the UGTT is more compromising. Tunisia's political system has also caused the UGT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ess structured. The oscillations in terms of political position and party preferences, and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the coastal and inland regions pose challenges to the UGTT in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a r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Labor Unions; Tunisian General Labor Un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Social Movements

An Analysis of the Dilemmas and Its Reasons for Egypt'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Hanady Owis Mohamed Ali / 295

Abstract: Egypt is rich in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 great histor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s. As Egypt'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and val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dern Egyptian government has enhanced a series of laws such as the "Cultural monuments Protection Law", "Cultural buildings Protection Law", and "Urban Planning Law". This has greatly promoted Egypt'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ork. Egypt has also launched a number of projects for promot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u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economy and marketization, the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gypt'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s facing huge dilemmas, such as repeated robbery of cultural monuments, adverse impac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Egypti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backward technical standard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refore, the review and summary of Egypt's